

---

# 皖北形象：叙事、建构与反思

## ——以许辉的作品为例

王飒 李长中<sup>1</sup>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00)

**【摘要】**:地理、经济、社会等范畴的地域在向文本的地域转换的过程中,需要成为能够被作者掌握的文化结构和社会关系才有生成的可能。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公式化的想象性表述,地域被简化处理,以提炼特色、制造“区别”的方式呈现,这种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对地区特殊性的削弱,带有保留文化多样性和反抗经验贫瘠化的价值倾向,但作者如果不断夸张与放大地域特征,必然会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文本厚度。许辉作为书写皖西北地区文化的代表性作家,探究其作品在呈现淮河流域的自然和人文时如何利用想象性表述对地域文化进行个性化的转换和突破对于探讨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想象性表述 建构 皖北地区 许辉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9)05-0094-06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地域与文学的关系虽然早已被发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地域与文学之间的天然纽带关系。直到近现代以来,人们才从关注“文学如何叙述地方”转向“地方如何被文学地叙述”,其中渊源,或许和全球化带来的地区同质化有关。“国家由上至下推进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在交流工具(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各方面的强制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的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sup>[1]</sup>在这种普遍化知识的逻辑下,单一的国家视角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丰富的地域,造成了对丰富知识的伤害,地方性知识虽然仍存在于千百年来因袭而成的文化基因之中,但却在新建构出的普遍性知识的干涉下,难以得到认可与尊重,而被排除在“普遍性知识”的范畴之外。与此同时,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和同质化的长驱直入让原本相对隔绝的地域开始联通和互相渗透,地域带给人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遭受破坏。这种因破坏而致的匮乏感与失落感表现在文学上,即是文学试图在现实空间之外建构出一个地域的文学空间来抵抗地域特征的流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潮中,以韩少功为代表所呈现的楚文化、以贾平凹为代表所呈现的秦汉文化、以李杭育为代表所呈现的吴越文化、以乌热尔图为代表呈现的鄂温克族文化等,“向世人展示了怎样在博大世界中选择一小片土地,去全身心地爱一片土地,去赋予它以魂魄”<sup>[2]</sup>,文学从“关注如何叙述地方”转向“地方如何被文学地叙述”。现代文学中的“地方”作为一个文学书写的主题成为作家写作的核心,这样一个问题正是通过对地方的强调,找到了一种疏离主流的宏大话语,现代性话语所建构的那样一种同质化空间的“异位空间”。“地方”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突围者的角色,用富有鲜明特征的“地方”体现出对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反思,“地方”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寓言化表达。

---

**基金项目**:阜阳师范大学第一批横向合作项目(FYSK17-18ZD9)

**作者简介**:王飒(1994-),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生;李长中(1972-),男,河南商丘人,教授,博士。

与吴越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等以春秋时期的国家名称为地域文化命名相比，淮河文化是以水系网确定的地域文化，处于南北交融、混杂的地带，范围随着水域蔓延难有清晰的边界且内部之间差异明显。并且，淮河文化的概念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正式提出，其名称的传统并不悠久，因此有学者认为淮河文化更倾向于是一个建构性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性概念。而且，淮河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潮中因缺乏极具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与秦汉文化、蜀文化、楚文化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本地域的人群也因缺乏构建想象共同体的媒介而对地域缺乏认同，在寂寂的淮河流域作家群中，许辉是极具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一个。作为20世纪50代生人，其在80年代正值创作蓬勃期，要做“黄淮大地上行走的歌者”的他在对淮河流域做文学处理时，淮河流域就不再仅仅是一些冷冰冰的收集来的资料与数据。“它还包括了人的意向，人们可以从中体验到一个地方那些超出物质和感官上的特征的东西，并且能够感到对这个地区的依恋。”<sup>[3]</sup>地域是身份体认的象征，从个人对地域的感情以及现实生活中对地域构建的需要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地域的想象性与虚构性似乎比作品是否客观呈现地域更值得关注。

## 一、地域标识景观的提炼

当一个物质被人赋予了某种意向，那么这个意象和此物质的实体是融为一体的。一个作者在呈现家乡时，家乡就不再是简单的物理存在，而是以地方风物钩沉文化时间，并在语词上受既有的修辞惯例、意象成规的影响和束缚，把家乡转换为稳固的文化诗性空间。其间，文本的时空裁剪、地方风物的筛选与编码都暗含着作家个人意向和宏大的权力话语，现实地域与文本地域之间始终存在一道缝隙，难以缝合，而这其间便是想象性表述发挥作用的舞台。

许辉自称“淮北佬”，在黄淮大地上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与这块土地有难以解开的情感牵绊。但随着个人发展他离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越来越远，虽然他也“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但终究没机会再真正融入故乡的生活，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故乡难免始终笼罩着一层“怀旧”的情感滤镜。詹明信在对怀旧电影进行分析时，提到：“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sup>[4]</sup>

许辉表现出对故乡的风物、历史的热情。他不厌其烦地描写着故乡的一切，尤其是那些特定的恒常图景：麦、槐树、季节风、月亮、露水、少女、老人，还有千年不变的习俗。《焚烧的春天》中“水汽弥漫，有永远割不完的草”的草甸子、《蚕》里“望不到边的蚕场”、《麦月》里“火热太阳下正在成熟的麦田”，以及处处或隐或显出现的淮河，等等，这些都是在淮河平原上确切存在的，难以追溯源头的，用或隐或显出现的淮河水串联起来，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发挥隐形塑造地域边界的作用。这些在现代文学里早就具有传统原型意义的风物，是在既有的话语模式制约下再生产的文学意象，就像“梅兰竹菊”在中国语境下的生产与应用，早已不再仅仅具有表面意义，如许辉笔下的故乡、莫言的高粱地、贾平凹的商州、韩少功的马桥等一系列文学空间。现实一旦被转化为文学空间，它就必然成了一种与众多其他事物密切相关的符号，超越了原型，成为承载文化“记忆”与“经验”的文学想象。按照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界定，民众个体借由共同的语言、文字，或者地区象征物来产生对那些未曾谋面的全部个体的想象，并且这种想象是有限的，生活在“共同区域”概念下的民众通过对“他者”划分楚河汉界进行身份明确，进而升华出共同的情感。许辉从故乡中过滤出来的是乡土中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不易受现代文明影响的恒常风物，这些风物和淮河流域悠久的农耕文明紧密联系，许辉的“过滤”是对土地情感的一种发散与延伸，地方意识和地方情感通过这些具体事物才能落到具体可感的层面。

标识景观的选取体现了作者在对地域做文学处理时还包含着其对地域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基调的显现。正如许辉所说，“我生长在安徽，我的创作基本上取材于江淮大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sup>[5]</sup>但其呈现的风物其实并非如此广泛，反而表现出了单一性。在《走淮河》中，60篇散文，题目信息涉及小麦的有17篇，涉及淮河的有12篇，而且具有丰富的农时信息，比如《霜晨在五河县林北乡看日出和浓霜裹盖的麦田》《四月中旬在淮北平原看冬小麦、喝牛肉汤》《在蚌埠与五河之间的淮北大堤看小麦收割》。即使足迹进驻渭河平原、陕北、江南，甚至欧洲等非故乡地域，他观察的仍然是小麦的种植和收割，如《在欧洲看冬小麦》《银川平原的冬小麦》《在吴山的麦田里》《在江南看冬小麦、油菜花并寻找诗人的足迹》。反复大量进入其地域描写的是与农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月和农时的联系、槐树和饥荒记忆的联系、阳光和麦月的联系、淮河与灌溉的联系，等等。与农业生产无关的事物很少呈现，他无数次描写的麦田永远是“厚厚的麦浪”，淮河水永远“不尽流淌”。作为一种对现代性抹杀地域丰富

性的反抗姿态,原始地域文化中一切具有深厚历史的与当代社会相对立的成分都获得了“重审”和“再发现”,变成某种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地域中恒常存在的事物被放置在线性时间概念的环境中,“现在”被看作是某一个“过去”的产物,或者,通过对已被定义却难以触摸的“过去”进行想象,地域特征的流失就变得隐约可感。许辉以个人情感与价值观念构造了一张风物符号之网,这张符号之网体现了一种排斥原则,将事物分为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地域的原始性成为抵抗特征流失的灵丹妙药。于是地域的文化成规仿佛给作者戴上了一套枷锁,作家自身对地域的充沛情感也仅仅是进一步强化了成规的力量,并通过写作来延续既有的文化传统。

除了对地域风物做删选裁剪的空间处理之外,在时间观念上,许辉作品中的文本时间也呈现了其独具特色的处理方式,他在其多部短篇小说中呈现出迥异于现代性带来的发展感和变迁感,而是呈现一种凝滞的时间观。如《碑》的叙事中,主人公罗永才的心境是凝滞的,际遇也是凝滞的,偶尔穿插的砍柴老人,他的生活也是静止的,几十年如一日,甚至七十岁的人看起来只有五十岁,连年龄感都是停滞的,唯一可以呈现时间带来变化的物品是那一块石头被一斧一凿洗成的碑;以及在《圆形房》里,许辉写到:

还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所未曾谋面的动物以及其他生命体,它们是怎样在按照自己的生活规律和程序在生活着,在每一分每一秒切切实实地生活着<sup>[6]26</sup>。

小说中呈现的淮河流域的人们,其个人生涯仿佛游离于线性时间之外,在他们身上“不变”的这种特质的对比下,现代性带来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时间退居于地域时间之后,以这种对比下的纵向的差异性时间构成了对现代性和同质性的反抗。地域特征的流失让作者在想象与个人意志的影响下,积极建构了古典的地域时间,在古典的地域时间与现代性时间的巨大对比中,寄托着作者永恒的乡愁。

## 二、方言的粗鄙化处理

“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相传播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符号体系的构建,人们才得以很好地沟通、绵延传统,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sup>[7]</sup>方言是一种最普遍的地域文化表征形式。许辉同其他书写地域的作家一样,选择了用方言进行叙述,淮河地区的方言体现了地域塑造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伦理观,其间具有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然而,淮河流域方言是在普通话的对照下才彰显其作为地域特色之象征的意义,如果缺乏了以普通话为寄居形式的国家话语、国家意识的参照,方言书写也就失去了价值。

淮河流域方言与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相比,其语法、意义及语音间的差异并不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域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因此,出于一种或有意或无意地凸显特征的目的,许辉挑选了那些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对应表达的方言揉进小说文本。在这种处理方式下,“口语方言”转换为“书面语方言”之后,被文字承载的方言就成为一种能够超越方言的语言,文字使书面语言获得巨大力量,使其表达力大大超过了纯粹的口语方言<sup>[8]</sup>。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的特征也在冷冰冰的、纯粹的工具性语言的覆盖下,以方言为呈现方式,表现出一种无法被主流话语、现代性观念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含义。以中篇小说《鄆家岗的阌娟》为例,阌娟作为小说唯一的主人公,作者大量反复用方言“肉”对她进行描述,出现次数多到完全影响到了行文节奏,甚至给人以拖沓之感。比如在小说开篇“人人都说阌娟肉,阌娟也觉得自己肉。”还有小说中反复穿插如鄆所长说:“唉,阌娟,你真肉!真肉!”“唉,阌娟,你真肉,真肉!你比他妈的猪都肉!”还有商大姐说:“唉,鄆娟,你真肉,真肉!”<sup>[6]113</sup>“肉”到底怎样用普通话下一个准确而规范的定义,作者并没有给读者一个交代,而是在叙述中让读者隐约可感“肉”的含义。“肉”的含义只能从其经常出现的栖居环境中获得,这样的环境不仅包含语义,也把人的面部表情、语音的抑扬顿挫,以及人生存的整个境况一网打尽。这似乎是对公共交流语言权威的一种解构。公共交流语言作为一种标准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仍难以跨越地域和时域造成的语言屏障,因此地域的语言具有其难以抹杀的意义。

另外,许辉在文本叙述中迫切提炼方言特色的意图太过明显,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对乡村语言的粗鄙化想象,一定程度流失了文学的审美意义。比如《鄆家岗的阌娟》中反复出现的地方脏话:“小狗攘的俺抢他女人他就能叫俺在鄆家岗这狗操的地方窝

一辈子”，“呜呜，小狗日的俺拔根鸡巴毛也比他强”，还有在《焚烧的春天》中女主人公小瓦喃喃对丈夫讲：“好国柱，俺得给你下个崽啦，俺能给你下三五个崽呐。”从观感上来说，这种方言的呈现是粗俗的，但所谓“粗俗”也应该放置在一个标准的语言坐标下观察才可以得到判断。“粗俗”的语言如果仅从本地域中取出来，其意义难以得到估计，只有放进“现代性进程对地域差异的吞噬”和“书面语对准确和典雅的追求”这个“大他者”的语境下才可以得到估价。如果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我们是否可以猜测：“粗俗”的、不可被标准语言通约的方言其实是作为地域“原生态”象征的一种呈现方式，同纯朴、真诚、自然，与大地相依为命这些特征一道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已丧失的地域特征，无形中发挥了传统的“乌托邦”的投射功能，回应了现代性进程中因地域流失带来的焦虑感，所谓地域特征除了发掘出来的部分之外，是不是一种在对差异和特征的渴望下进行的地域的想象与构建？

许辉拥有的知识分子和离乡者的身份，使他对于家乡必然产生一种距离意识，这种距离意识或许并非出于他的自觉，但的确让他能保持一种对地域特征和民间语言的敏锐。尽管作者所做的仅仅是以一种貌似客观中立的态度呈现这些地域特征，但这种呈现本身就相当于对“地域特征”进行了挖掘与再阐释，当作者试图提炼与阐释譬如方言这些地域特征时，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地域进行意义的编码与想象吗？不是试图将淮河流域重新在一种现代性进程中予以界定并让其可被归类和确定边界吗？

### 三、地域观念对叙事成规的干预

“因为人们生活所凭借的符号系统是特定的、地方化的、分特性的，借助这些符号系统的作用，意义结构才得以形成、沟通、设定、共享、修正和再生。这个系统的作用，是甄别日常行为的意义和理念，地方性知识就是力图维持这些特定的意义系统，并根据它去组织行动。”<sup>[9]</sup>

淮河地域的人们依据该地域生成了一整套与地域环境相洽的知识、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该地域作家长期浸润在这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模式之中，使得地域生成的一整套意义系统大面积地介入文学话语生产，不可避免对现实世界进行一种简化，一种排列，一种潜在的解释，一种想象。那么，它刻意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作家在叙述地域、呈现人物时不自觉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语词既是描述但同时又隐含了一种价值判断。

如果将“意义产生于对立”这项符号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渗透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之中，很容易发现，在表述地域文化的作品中，存在这样一种模式：正在被现代化进程吞噬了特征的以乡村作为表征的地域往往以城市文化为坐标或隐或显地展开叙述，在如是思维模式中，事物的意义不再是其本身，而在于其与对立者的关系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意义自然而然蕴含其中，当“结构”得以揭示时，也就发现了结构所依凭的“整体”的存在。

从叙事视角来看，许辉惯于使用全知的上帝视角，其笔下的人物、地域和叙事者之间是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追求的是对叙述对象理性客观而逻辑的掌握。然而这种对笔下人物不介入的理性客观态度仍无法从“城”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超脱，因为农耕文化语境中的乡村指代的就是整个农业社会，而作为独立的、具备自身文化意义的乡村概念，则是经由现代都市的存在而对对象性地被确定的。在许辉的作品中地域似乎依然仅仅指向农耕文化语境中的乡村，而城市被排除在地域之外。

首先，表现在对“城”这一文化符号的内涵做了简化处理，压缩其丰富性，城市不作为展现地域文化的主要空间。在对人物的处理上，城市是让人物际遇、性格发生扭转的环境因素，而扭转的正是原本地域所赋予人物的性格和品质。比如在《焚烧的春天》中，原本小瓦和国柱无忧无虑、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大草甸上，但国柱顺应进城打工潮而与小瓦分离，国柱抵挡不了城市生活的诱惑开始赌钱，小瓦的生活陷入空虚寂寞以及经济困顿。小瓦并未去过城市，对城市的全部认知来自城市加诸国柱的影响，城市吞噬掉了小瓦和国柱原本与乡村经济、文化结构相洽的幸福观。在《农民工》中，以张如意为首的来自安徽阜阳的农民工群体初到城市就遭遇了一批擅长坑蒙拐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城市人，城市人几乎无正面形象。接着，另一人物杨稳当原本在乡村生活中表露

出的聪明、机灵,在入城不久就开始发生变化,做工程偷工减料、贪图享受、玩弄手段,很快与城里人打成一片,不再具备作者所认为的被地域文化所塑造的诚实、讲信用等品质,而被城市拖拽进欲望的染缸,融入城市成为背叛故乡的一种象征,甚而一步步走向作恶的深渊。与此对比,主人公张如意表现出的对勤劳、诚实守信、帮扶同乡人、有担当、有契约精神等品质的坚守,仿佛是在表达作者对地域的偏爱与袒护:城市文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逼近以乡村为代表的地域,城市文化处处显露出他对乡村的文化优势和文化特权,主人公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是作者对土地正在日益消退的文化光环的再度开发,也是以乡土道德美学为据展开的对城市的审视和批判,这难免会造成作品的道德宣讲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本身的审美意义。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它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环境中为自己定位,它隐蔽而又坚固,主体通常根据这种体系形成的框架想象自己与现实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观念体系的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就在于,人们仍然会按照这种框架提供的基本方位和坐标感知、理解、阐释自己的生活状况<sup>[10]</sup>。地方意识形态塑造出的话语成规表现在文学上,往往会将原本复杂多元的生活削足适履地塞进一种民间故事的成规中去。如果我们从许辉小说的发展走向分析他是如何以地域赋予他的意识形态为框架来想象人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发现地域塑造给他的思维以“故事成规”的方式支撑着他对人物发展和故事走向的想象,比如善恶、黑白的二元划分,成败荣辱的归因分析,善恶有报的发展定论等这些地方性知识力图维持的特定意义系统,并根据它去组织人物行动和进行价值判断,在其中可以看出作者认可了某些地域性和抵抗了哪些现代性。

淮河文化作为“贫穷文化”,具有先天性的不尚竞争、安贫乐道、民风粗悍、轻死易斗、重农轻商、重道德而轻技艺、知性不足而质朴有余等特点<sup>[11]</sup>。在皖北地区这种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的地区,往往把守祖坟、续香火作为价值观的基础,把“老婆、孩子、热炕头”视为人生理想,把背井离乡看成人生的不幸事件,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小瓦在决心跟国柱进城时一把火烧掉大草甸上的房子时“泪珠吧嗒吧嗒往下掉”,张如意在离开张杨王寨时“心里涌出酸酸的东西”。

背井离乡在城市闯荡的这批农民工,在进城之初就已被浸染了淮河地域生产的思维传统、语义逻辑,其身份与性格特质已被地域文化作了生存化驯服。在许辉笔下,主人公张如意仿佛被上帝开了“金手指”,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因其“忠厚、讲信用、对家乡兄弟厚道”迎刃而解,而背叛了家乡兄弟、利欲熏心的杨稳当最后却锒铛入狱,人生尽毁。这种对比是自然灾害多发的淮河流域中生成的重团结、重义气、看重人际关系的文化价值观的反映,人物按照作者的这套价值体系排列成完整的秩序,走向作者认为的应该形成的“结局”。但如果把张如意为铁孩受工伤之后还要替他娶上媳妇让铁孩“不绝户”和替杨稳当还债的举动放入城市文明的逻辑中观察,很难让人理解张如意在与铁孩和杨稳当没有感情基础、只存在老乡关系的情况下为什么就要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哪怕牺牲女孩的幸福也要努力让铁孩传宗接代的最高幸福标准有没有那么不容置疑?以及张如意在商界战无不胜是不是仅仅是他身上被地域打上的部分优秀品质无意中遵守了城市经济规律才得以显现,而不应完全归因于讲义气,其中对成败荣辱的归因是过于简单还是为了突出地域文化的优势而强把其纳入某种故事模式和规范中呢?出身于淮河流域的张如意在城市的大获全胜仿佛意味着地域文化对现代性和城市文明的渗透,是地域文化对自身可以无往不胜的自我想象。

功成名就模式一直顽固地存在于民间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越是生活艰难困苦,民间越葆有对这种故事模式的审美预期和悦纳,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处理、屏蔽掉生活复杂性的传奇性故事发展走向很难让人评价其是为了探讨人性的复杂和突显地域文化价值,而更像是为了本土人群服务,通过“功成名就、善恶有报”的故事模式来帮助本地域人们编织关于地域历史的共同记忆,是构建一种为了凝练地域文化特色的美好的文学想象。

作家的权力是虚构,“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sup>[12]</sup>文学上的地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面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地域特征丢失的焦虑,对地域特征的凝练和想象唤起了“地域身份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就地域表述而言,地方性知识的意义远不如不易受现代化进程干扰的自然风物与自然秩序稳定,许多时候,某一个时期、某一地域上的“公理”在另一时期并不适用,农业生产的意义、家庭伦理道德的意义、族群族规的意义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以“他者”作参照去判断,在历史发生重大断裂和地域文化遭受猛烈冲击时,优秀的地域文学必须重新对在特定历史和地域中生产出来的知识发出新的质询。

---

**参考文献:**

-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叻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4.
- [2] 程虹. 寻归荒野[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122
- [3]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01.
- [4] 詹明信. 晚清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吴美真, 译. 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54.
- [5] 许辉. 走淮河[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32.
- [6] 许辉. 人种[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 [7] 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C].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291.
- [8] 沃尔特·翁. 口语文化与书面语文化[M]. 何道宽,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8.
- [9] 克利福德·吉尔兹.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 郭于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1.
- [10]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A]//罗刚,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C].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57-61.
- [11] 杜红梅, 李长中. 乡土文化的另类书写——以许辉为例[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2(3):61-65.
- [12] 王安忆. 重建象牙塔[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12.